

松柏常青，不忘当年金戈铁马挥师西北

重温感天动地的扶眉战役



新华社西安2月25日电(记者孙波、陈晨)辛丑春节,扶眉战役烈士陵园。赵存仁烈士的墓碑前,多了几束游客送上的鲜花。

许多人来到这里,是因为听说了流传几十年的“一封迟到家书”的故事。

“你我夫妻一别12载,书信全无。我能遇到这样的好政府,不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了。望你在部队安心打仗,胜利归来……”

但尚未收到妻子林霞这份饱含深情的牵挂,时任第一野战军1兵团2军4师11团政委的赵存仁,就牺牲在解放西北的战场上。

青山为证。烈士长眠的土地上,曾发生过一场影响深远的战役。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以陕西关中扶风、眉县为中心,爆发了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上国共双方投入兵力最多、规模最大、我军歼敌最多的一场战役——扶眉战役。

此役铺平了解放大西北、进军大西南的道路,人民解放军金戈铁马自此挥师西进,所向披靡。

松柏常青,历史不容忘却。

今天的烈士陵园中,2160座卧碑一层层排开,向远方的台塬延展开去,肃穆、庄严。初次到此的人们,无一不被眼前的场景深深震撼。

时光的指针回拨到1949年初夏。那时,2160个墓碑上的名字,还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西安解放后,胡宗南与盘踞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结成联盟,妄图趁解放军立足关中未稳之际联合反扑,夺回西安。

当时,一野在关中地区的兵力有10余万人,国民党军有21万人,敌众我寡态势十分明显。

通过扶眉战役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任晓峰的介绍,能感受到当时的战事声声急:

5月26日起,划归一野建制的18、19兵团千里急行军,先后从山西风陵渡、禹门口渡过黄河入陕。

6月24日,18兵团全部抵达西安。



1月28日拍摄的陕西眉县扶眉战役烈士陵园(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刘潇摄

至7月3日,19兵团分别到达富平、三原、高陵、泾阳一线。

至此,一野在关中地区的总兵力达到33万余人,士气高昂。

西北敌我兵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为扶眉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5月26日到6月27日,毛泽东先后多次致电彭德怀,与其商讨关中决战事宜,最终确定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战术。”宝鸡市委党史研究室原调研员李洛发说。

从扶眉战役纪念馆陈列的一封封电报中,仍可感受到当年大战前的紧张气氛。

战前,18兵团沿陇海铁路、咸阳-凤翔公路从东向西推进,1兵团在渭河南岸布防,2兵团从北路急行军进入岐山,并派出第4军守住西大门,防止敌军向西逃窜,从而形成对敌三面夹击之势。

7月10日,扶眉战役正式打响。渭河两岸,一时硝烟弥漫。

7月12日,一野2兵团、18兵团向被

压缩在渭河北岸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经过5小时激战,歼敌大部,敌军乱成一团,涉水突围。正逢渭河水暴涨,敌军大部分溺水而亡。逃上南岸的8000余人,又落入1兵团布设下的天罗地网。

7月13日,岐山、凤翔相继解放。

7月14日凌晨,宝鸡解放。

至此,扶眉战役胜利告捷。

“扶眉战役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歼敌4.4万人,收复和解放了武功、眉县、扶风、宝鸡等9座县城,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上的敌我力量对比。”李洛发说,向东看,陕西与解放区连成一片。向西看,这场大捷粉碎了胡马联盟,砸开了解放大西北、进军大西南的大门。

自此,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入西北,所向披靡。

青山有幸埋忠骨。扶眉战役中,解放军共伤亡4600余人,300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其中姓名可考者2160人。

“烈士平均年龄25岁,最小的仅有14

遗迹无言,犹记先烈孕育中国革命“火种”

探寻西南联大地下党往事

新华社昆明2月24日电(记者庞明广)说起西南联合大学,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这里大师云集、群星闪耀,在极度艰苦简陋的环境中,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但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所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的高等学府,同样为中国革命孕育了珍贵“火种”。

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员,既要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又要隐秘开展革命活动,在中国革命史和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一所学校党员曾占云南三分之一

走进位于昆明市中心二一大街的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坐落在校园深处。留存于旧址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西南联大原教室、“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等遗迹,无不在诉说那段艰苦而辉煌的办学历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与文化命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南京陷落,日军溯江而上,危及长沙。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4月抵达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不仅有优良的学术传统,更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比如,北大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最早建立支部的单位。”长期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说。

西迁昆明后,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员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

“到1938年秋,西南联大才重新开始建立党组织。”吴宝璋说,1938年10月,被党组织派到大后方开展工作的原北平崇德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力易周在考入西南联大后,与其他3位党员共同成立联大临时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自此之后,西南联大党组织逐渐发展壮大。在西南联大党员人数最多的1940年,全校共有党员83人。

“当时云南全省仅有247名党员,西南联大就占了三分之一。”吴宝璋说。

据《北京大学校史》记载,当时,西南联大党组织是云南党员人数最多、最集中、力量最强的地下党组织。联大地下党组织团结广大师生,在开展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核



这是西南联大博物馆展出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画像(2月9日摄)。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牺牲36年后,世人才发现她是党员

据统计,在西南联大学习过的地下党员共有206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甚至献出宝贵生命。

被称为中共“超级特工”的西南联大学生熊向晖,1937年在长沙便受党派遣从事地下工作,以超人的机智、果敢、坚韧,赢得胡宗南赏识,巧妙送出国民党“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议”等重要情报,毛主席称赞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

毕业于西南联大英语专业的地下党员傅冬菊,是抗日名将傅作义的长女。1948年,平津战役即将打响,党组织派在天津《大公报》工作的傅冬菊回到父亲身边,最终为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一二·一”惨案中壮烈牺牲的四烈士之一、西南联大学生潘琰,直到她牺牲36年后,世人才发现,原来她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1944年,29岁的地下党员潘琰考入西

南联师范学院。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一二·一”惨案,国民党特务闯入西南联大等学校,殴打、追杀学生。潘琰被手榴弹炸伤后,仍奋力抢救其他同学。暴徒用石块猛击她的头部,还用铁条猛刺她的腹部,待同学赶来救她时,她已奄奄一息。

潘琰牺牲时年仅30岁,临终前她还用微弱的声音叮嘱同学:“同学们,团结呀!战斗!战斗!”

“当时组织要求地下党员严格保密,潘琰的组织关系还没转来联大,所以学校没人知道她是党员。因为在学校表现突出,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还曾准备发展她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副馆长龙美光说。

直到1981年2月,经中组部确认“潘琰同志是中共党员”,她的党员身份才被后人所知。

吴宝璋说,西南联大办学8年多,有15位师生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有10名是地下党员。

“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基层党组织,但它又不是一般

岁。”讲解员窦妍动情地说道,一个个年轻的生命,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史诗。

“扶眉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双桨划出来的、用大车拉出来的。”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任惠林说,18、19兵团由晋入陕,人民划着船帮他们渡过黄河。战役期间,支前群众组成的大车队、担架队沿西兰公路、咸宝公路前进,犹如一条条长龙,车轮滚滚、浩浩荡荡。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昔日英雄长眠的战场,硝烟散尽,早已换了人间。

2月春来早。国家级(眉县)猕猴桃产业园区内,一辆辆运输车往来穿梭。一家果业公司里,14条选果线一字排开,工业机器人挥动长臂,将一箱箱猕猴桃分拣装箱,销往全国各地。

当年子弟兵誓死夺下的城池,如今已成为全国知名的猕猴桃产业示范县,安乐富足,处处生机勃勃。

在赵存仁牺牲的眉县金渠镇,数千亩猕猴桃示范园里,尽是农民忙碌的身影。依托猕猴桃等主导产业,2019年,眉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37万元,全县猕猴桃品牌价值达128.33亿元。

“变的是生活的境遇,不变的是党的初心使命。”金渠镇田家寨村村支书孙乐斌谈及今昔变化,感慨万千。

直播带货、休闲农业、工业旅游……眉县农业产业化办公室主任陈辉介绍,全县猕猴桃种植面积达30.2万亩,5255户贫困群众发展起2.2万亩果园。当地不断延伸产业链,全县已有23家鲜果、果酒、果汁及冷链加工企业。小小“奇异果”,为困难群众摆脱贫困、奔向小康立下了“头功”。

孙乐斌说,我从小是听老人讲扶眉战役的故事长大的。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冲锋在前,战果累累。今天,党员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处,又摘下了小康生活的累累硕果。

“紧紧依靠和发动群众,是扶眉战役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眉县县委书记刘志生说,今天,我们可以告慰革命英烈的是,当年他们为之浴血奋战的新生活,已然变成现实。

的基层党组织。”吴宝璋说,掀起了国内反内战、争民主高潮的“一二·一”运动就是在西南联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也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

联大红色记忆激励后人

抗战胜利后,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回到北方,而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则留了下来,成为如今的云南师范大学。

2011年9月,云南师范大学在原“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基础上,成立西南联大博物馆。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先后被列为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介绍,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年均接待海内外参观者90余万人次,其中每年开展青少年教育不低于10万人次。博物馆还组建了学生义务讲解队,每年提供义务讲解5000多场。

云南师范大学2019届毕业生钱光美,曾是西南联大博物馆学生义务讲解队队长。“大学四年,课余时间、周末、寒暑假我基本都在做讲解员,每年要讲解上百场。”她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为来自四川的中学生参观团讲解,听完联大地下党员的故事后,很多学生已是泪流满面。”

如今,钱光美已成为昆明市云铜小学的一名语文教师。“去年12月1日,我在课堂上讲了西南联大地下党和‘一二·一’运动。孩子们应该铭记历史,记住在昆明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她说。

26岁的党员杨永琴也曾是西南联大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2017年从云南师范大学幼教专业毕业后,她主动回到家乡,在云南省楚雄市十分偏远的三街镇普嘴民族小学任教,成为这个高寒山区彝族村唯一的幼教老师。

“做讲解员时,西南联大地下党员的故事对我触动很大。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们不仅努力学习,还心系民族存亡,为革命不惜牺牲生命。”杨永琴说,“我希望能像先辈一样,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等孩子们再长大些,我也会给他们讲西南联大、联大地下党的故事。”杨永琴说。



“红色情书”见初心

一封“情书”承载着什么?从“红色恋人”高君宇写给石评梅的信中,可以读到爱情和友情,更读出他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初心”。

“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1924年,在上海赴广州的船上,望着平静的大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高君宇给恋人石评梅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高君宇故居纪念馆负责人史锦明在这里工作了23年,不知给多少游客讲过高君宇和石评梅的恋情,无数次思索这是怎样高尚的“历史使命”。

“他将革命与爱情分开,但又同样爱得奋不顾身。他的另一个世界不属于石评梅,也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这种思想和精神境界永远不过时,启发一代代年轻人对事业、学业、爱情等进行思考。”史锦明说。

1896年10月,高君宇出生在山西静乐县峰岭底村(今属娄烦县)一户有名望的人家。受父亲影响,他思想活跃,赞成新生事物,向往革命。

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锤炼,使高君宇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1920年,他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和邓中夏等人秘密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并于当年冬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高君宇是全国50余名党员之一。

高君宇比石评梅大6岁。石评梅17岁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一所中学任教,是进步女作家。

两人初识是在一次山西同乡会上。之后,他们谈人生、谈理想,高君宇还给石评梅修改诗句。

在山西博物院,可以看到高君宇写给石评梅的11封信。部分信笺已泛黄,红格竖栏间依旧散发着墨香。

石评梅在信中倾诉“说不出的悲哀”,高君宇回信宽慰她:“世界而使人有悲哀,这世界是要换过了;所以我决心来担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呢?”

信尾他鼓励石评梅:“愿你自信:你是很有力的,一切的不满意将由你自己的力量破碎了!”

几页素笺,情意绵长。

1925年,高君宇因病离开人世,生命止步于29岁。石评梅在悲痛中写下著名散文《墓碑哀歌》。

“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的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

3年后,石评梅病逝,时年26岁。根据生前遗愿,亲友们将她葬在高君宇墓旁。

在高君宇的墓碑上,刻着石评梅手书的碑记:“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他们革命青春的写照。

(记者王学涛、徐伟)新华社太原2月25日电

文心初见英雄气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内,两页泛黄的作文纸引人驻足,这是杨靖宇少年时代所写的《战区灾民生时之感想》。

“偶见一老翁,髯须俱白,面似鹄首,身披褐衾,足跣而行,若若若祖。从而问之,俯首不答,又问之,凝目泪下曰:‘吾祖仕官,九世同居,金积堆山,地连阡陌,以为终身万无冻馁矣。……延及今日,房屋被焚,地无立锥,族家兄弟苗裔,摧残净尽,渺渺一躯,落为乞丐,聊以度日。’余闻之后,不禁惘然生悲。”虽然文物的一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但是经过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刘强敏的辨识转述,我们依然能够看出,寥寥数百字记述了一位老人在军阀混战中家乡惨遭蹂躏、沦为乞丐的不幸遭遇;也深刻诉说着一位少年对家国情运的忧虑,和发自肺腑的报国情怀。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著名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他曾只身与敌周旋数个昼夜,有人劝他投降,但他说,“如果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面对这篇文章,正在哈尔滨市萧红中学读初三年级的赵虎博思绪万千,这也是他第三次来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在他心里,这篇文章是了解那个战乱年代的窗口。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理解。”赵虎博回忆说,第一次读的时候,自己掉眼泪了,“当时的中国民不聊生,文字记述让我更加透彻地明白,旧时代下普通百姓的流离失所。而今天的我能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求学,享受着幸福平安的生活,这是多么天差地别的对比。”

刘强敏介绍,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之时,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困苦。文章揭露了军阀混战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作者对劳苦大众的无限同情。

试想,倘若国家太平、百姓安宁,当年那个刻苦读书的少年定会学业有成,日后以另外一种方式报效祖国。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杨靖宇等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用自己的生命保卫祖国,捍卫家乡,换来今天的和平。

“横31厘米,纵27厘米,重21克。作文用毛笔书写,字体工整,全文共480余字……”纪念馆里,赵虎博和同学们记下了杨靖宇作文的每一个细节。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壮烈牺牲,牺牲时只有35岁。如今,战火的硝烟已然散尽,杨靖宇的英雄事迹人民不会忘记,他的精神人民不会忘记。

(记者董宝森、唐铁富、孙彪)

新华社哈尔滨2月24日电